

“觉醒年代”的一组信札

张丁

以物鉴史

既要负责每期稿件编辑,又要负责刊物出版发行,编辑群体实际上已经分裂,稿源不济,出版发行工作也出现问题,势必另起炉灶。《新青年》这样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舆论阵地,陈独秀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他在写给北京同人的信中既维持着战友情谊,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主张。尺素鸿雁,纸墨之间,难掩无奈与遗憾。

从1920年9月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解除了原与上海群益书社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自办印刷发行,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陈独秀公开发表《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中共理论刊物,直至1926年7月停刊。

陈独秀等致胡适的信札曾长期保存在胡适家中,胡适去世后,由其子胡祖望及儿媳曾淑淑保存。2009年初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从居住在华盛顿的曾淑淑家中征集到这批书信,计划在当年5月份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上公开拍卖。拍卖前,这批书信曾在北大图书馆和国际饭店进行展出,多位文物及党史专家看过,均认定为真品,是一批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佳的重要历史文献。

书信文物的价值一般从三个方面判断:通信双方的知名度,书信的内容是否涉及重大事件,书法是否优美。就这批书信而言,通信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内容涉及《新青年》办刊思路的分歧,而这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对于研究新文化运动史、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陈独秀的书法功底深厚,他的信札法度严谨又朴素洒脱,具有一定艺术性。因此,此批信札一经露面,立即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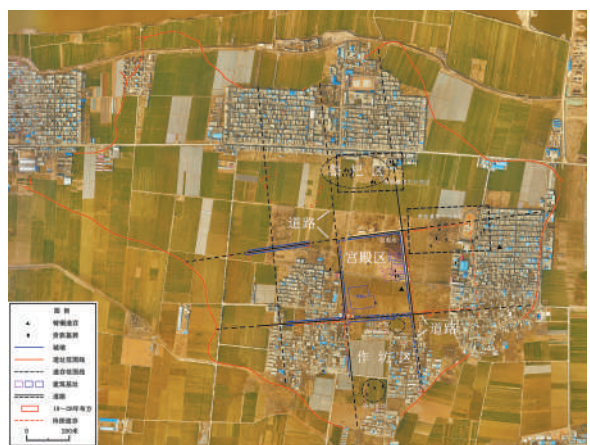
2009年5月30日上午,13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被打包集中拍卖,经过数轮激烈竞争,最终被北京的一位资深收藏家竞买成功。中国人民大学立即与国家文物局协商,拟利用国家文物优先购买的相关规定,征集这批信札,征集资金由两位校友捐赠。经过各方紧张工作,6月5日,国家文物局向嘉德拍卖公司发出《关于优先购买“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的函》,决定对拍品按照成交价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此举是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首次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7月27日,国家文物局把这批珍贵信札整体交付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

已经完好保存近90年的信札终于回到了它的发生地,静静地向人们讲述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
图①:北京《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
图②:1920年5月7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的信。
图③:北京《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大门。
朱悦华、张丁供图 版式设计:赵偃汝

核心阅读

这批信札的通信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内容涉及《新青年》办刊思路的分歧,而这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对于研究新文化运动史、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二里头都城遗址布局结构。

赵海涛供图

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60多年的持续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二里头遗址在河南洛阳盆地偃师市,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显示它在二里头文化乃至东亚地区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网络,把都城规划成以宫城为中心的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宫城南北,共同形成都城的中轴区域,中轴区域东西两侧则是贵族居住和埋葬区。严整有序的布局规划显示出严格的社会等级,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出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加工作坊设置在宫城以南,并以围墙防护,体现出对奢侈品的生产使用权力的垄断。在宫城北部设置专门区域进行祭祀,表明对祭祀活动的特别重视。使用复杂珍贵的青铜、玉质礼器及绿松石龙等重器体现等级礼仪。使用较大墓穴、随葬丰富珍贵的用品,显示严格的丧葬礼仪制度。

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产生了最早的王权和王朝国家,二里头遗址成为王国的权力、祭祀、礼仪、经济等方面的中心。这些都是认识当时社会历史极其重要的内容。

多数学者认为,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所处的年代、地域、发达程度、发展阶段等诸多情况,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夏王朝的遗存,是研究中国早期王朝国家的重要对象。因此,以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为基础进行夏文化探索,也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

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是考古研究的两个基础。因此近几年,我们继续把探索二里头都城布局结构作为中心工作。对中心区西南路口处的发掘,弄清了原被民房压占、跨建于宫城西墙南段的8号基址为南北长方形,面积近190平方米,其应为宫城西墙南段具有门道性质的夯土建筑。还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作坊区围垣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垣的东南角。从这些发现可以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垣的东南角,其他墙垣有待探索。继续扩大工作范围,发现“井”字形道路向更远处延伸,宫城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延伸,自宫西路向西延伸的长度均超过400米。道路两侧多发现墙垣,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宽度接近。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与西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相邻两条南北向道路之间的距离大致接近。

二里头都城这些新发现的道路、墙垣和多个网格,为继续进行布局研究以及其他综合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宫城居于中心,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的高度集中。多个区域外侧以围墙间隔、防护,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人群,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中原龙山文化的聚落布局多是居葬分离,二里头都城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体现了二里头先民的创造能力,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布局结构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周原的殷人聚落都有类似发现,表明这种制度被商、周王朝继承,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引领作用。二里头文化创立的都城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制度模式,成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础。

二里头都城的布局探索工作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城中心区是否存在更大范围的道路和墙垣,是否可以划分为更多网格?各网格的内涵有何异同,相互关系如何?都城内有没有对水资源、水环境的改造利用设施?有没有与大型夯土建筑相称的陵级大型墓葬?周边是否存在拱卫、支撑都城的“卫星”聚落?等等。这些重要问题,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工作去探究、揭示。

二里头遗址是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如何正确处理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利用、传播工作的关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相信通过科学规划和持续努力,在上述方面会有值得期待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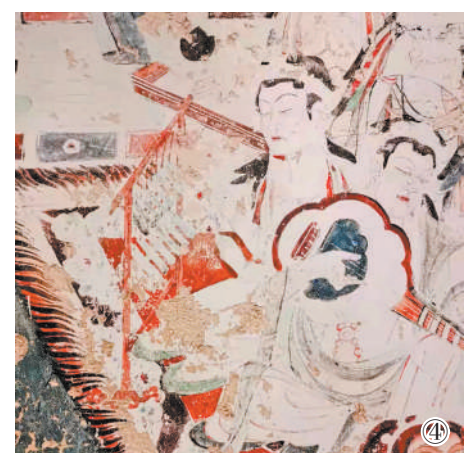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二里头都城布局结构进一步明晰

赵海涛

文明交响愈加浑厚

周飞亚



唐。约一人高的木架,分上下两排,每排悬挂8片金属片,乐声有诗云“高楼漏滴金壶水,碎电打着山寺钟”,可以想见其音气势。敦煌壁画里有大量响的图像,形状及演奏方式都与故宫所藏方响一样,可以推测,方响是由西域传入中原,最后成为宫廷雅乐的一部分。

大量婚嫁图反映出古代的礼仪风俗。如莫高窟第9窟壁画中的奠雁之礼。奠雁是新郎到新娘家迎亲所用的见面礼物,因为雁为候鸟,择偶专一,象征男女信守不渝,从一而终;雁群飞行队形不乱,喻指婚后家庭长幼有序。奠雁之礼一直延续到清末,还传播到朝鲜等国,后来因雁越来越难得,遂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又以鸭、鸡、鸡三活禽代替。第8窟壁画有迎亲场景,“婚者,昏也”,婚礼



活动要在黄昏后进行,画中清晰展现了“执烛前马”的礼俗。第12窟的拜堂行礼图十分有趣,帐前的新郎五体投地,跪拜宾客,新娘却盛装侧立于旁,表现了当时部分少数民族女方“嫁不离家”的婚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专门辟出一章来讲述壁画如何绘制、造像如何成形。由于莫高窟开凿地的砾岩粗糙、疏松、易风化,无法直接绘画,故而需要先给岩层加上一层“皮肤”,这就是“壁画地仗”,用粗草泥、细泥、高岭土层层叠加而成。壁画颜料为天然矿物,经过选料、粉碎、除铁、研漂等多个工序制成,颜色纯正浑厚、艳而不俗,即使埋进土里多年也不影响色泽。绘画第一步是起稿。其中一种比较复杂

的起稿方式称为“粉本刺孔”,在纸上勾线稿,并沿墨线打出微小孔洞,然后将纸稿置于墙面,用装有色粉的袋子不断扑压孔洞,色粉透过孔洞在墙面形成色点,连成轮廓。线稿完成后,有的色块由师傅写上“色标”,弟子或工匠按标记涂色。目前敦煌壁画中已发现的色标有“夕”(绿)、“工”(红)、“廿”(黄),取字形中的局部为代号,也有“朱”“青”“紫”等全字。最后一道工序是勾线,即在局部精细补描。而那些金碧辉煌的部分,则还需要沥粉贴金或截金技法,用金箔营造出立体效果。

从莫高窟千塔出土的一件残损造像,可以看到其内部结构——最内层是搭建的木骨架,其上用草捆扎出人物的大体结构,再敷上粗泥使造像成形,然后用细泥塑造表层及五官、衣褶、配饰等细节,最后是上色。木骨架用本地树木,草多为西北常见的芨芨草,细泥用附近河床自然沉淀的澄板土加上细砂调制,皆取材于当地。木骨架上有木柱可以植入背后墙上凿出的孔洞,以固定造像。草扎既省泥,又可减轻木骨架的负重。壁画和造像的创作过程充分展现出古代工匠的智慧和精湛技艺,让人们在欣赏精美艺术时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原本庄严肃穆的画与造像,也因此变得亲近和亲切。

故宫与敦煌的188件文物,在丝路主题下汇成文明的交响。20世纪50年代,敦煌研究院曾在故宫午门举办展览,70年后再次相聚,重重时光的回应,让这首文明交响演奏得愈加浑厚。

文化遗产